

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

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主编

第二辑

科学出版社



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

第二辑

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2013年10月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年会暨嵩山文明与早期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全书共收入论文28篇。内容涉及“嵩山与中原”“文化谱系与社会变迁”“农业、手工业与社会”“嵩山·中原·文明”几个方面。

本书可供从事考古学、历史学相关学科的研究者和爱好者参考、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 第2辑 / 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03-044619-0

I. ①中… II. ①郑…②中… III. ①嵩山—文化史—文集 IV. ①K928.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24832号

责任编辑: 郝莎莎 / 责任校对: 张凤琴

责任印制: 肖 兴 / 封面设计: 北京美光制版有限公司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5年6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5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20 1/2 插页: 2

字数: 480 000

定价: 15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

学术顾问

李学勤 严文明 许顺湛 朱绍侯

编纂委员会

主 任：刘其文

副主任：王文超 李柏拴 丁世显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万令	王宇信	朱士光	朱庆柱
刘凤瀚	齐岸青	李 民	李文军
张文彬	张民服	张立兴	陈 英
罗哲文	赵德润	贾常先	徐立德
徐光春	高 星	郭 旃	寇玉海
阎铁成			

《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

编辑委员会

主 编：李伯谦 王 巍

副主编：杨焕成 郝本性 阎铁成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文华 任 伟 孙英民 孙新民

宋豫秦 张松林 张国硕 陈星灿

周昆叔 郑杰祥 赵富海 顾万发

郭黛姮 阎铁成 程民生

本辑编委

主 编：任 伟 赵春青

副主编：陈 英 朱乃诚

编 辑：柴小羽 张 颖 张国辉 姜 维

目 录

嵩山文明与早期中国——嵩山文明与早期中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赵春青 任 伟 张 颖 (1)	
在嵩山文明与早期中国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王 巍 (12)	
从区域研究到全局认识——在2013年嵩山文明与早期中国学术研讨会上的 总结发言·····李伯谦 (14)	
中原地区现代人类行为的出现及相关问题·····王幼平 (19)	
李家沟遗址与中原农业的起源·····王星光 (28)	
嵩山腹地凹形地貌与嵩山文明·····周昆叔 宋豫秦 张国辉 (39)	
嵩山文明与早期中国的几点思考·····赵春青 (48)	
嵩山圣山说·····姜 维 宋豫秦 张 颖 (52)	
试论嵩山文明中心的形成·····武家璧 (61)	
中原早期城址与嵩山文明·····马世之 (82)	
试论中原地区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特点·····杨育彬 (87)	
中原地区文明起源与形成的五个特性及其意义·····窦志力 陈 晓 (96)	
中原地区古代文明形成特征探讨·····郑杰祥 (108)	
孟庄龙山古城与共工文明·····李慧萍 (112)	
关于中国早期冶铜术起源的探讨·····王建平 (120)	
铜石并用时代的豫东·····张致政 (143)	
“文明时代”的中原和环太湖地区——不同轨迹和道路的比较·····方向明 (168)	
论文化交流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中的地位与作用·····靳松安 张 建 (182)	
中原地区两批距今4000年前后的王室玉器及有关问题·····朱乃诚 (205)	

玉石之路与中原文明形成的资源依赖——石峁玉器新发现的历史重建意义·····	叶舒宪（221）
先秦时期中原地区都城遗址人口迁移的初步研究——以陶寺遗址与二里头 遗址为例·····	赵春燕（233）
三代本土与外来文化考古人类学研究·····	易 华（240）
早期夏文化新探·····	袁广阔（244）
略论二里头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从南洼二里头聚落的发现谈起·····	张继华（259）
二里头文化第四期应该仍为夏文化·····	钱 燕（265）
郑州商城手工业者居葬关系研究·····	冉宏林（288）
探寻商代第一都的文字新线索——写在郑州出土商代牛肋骨刻辞再发现 10年际·····	李维明（297）
关于天亡簋的几个问题——再论“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	井中伟（309）
后记·····	（317）

嵩山文明与早期中国

——嵩山文明与早期中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赵春青 任 伟 张 颖

2013年10月3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聚落考古研究中心、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和郑州师范学院联合主办的嵩山文明与早期中国学术研讨会在郑州市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国内知名高校、科研院所的15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30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巍所长在大会上首先发言，他指出：嵩山地区在研究现代人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三大考古课题当中的重要作用日益被国内外学术界所认识。嵩山地区是中华文明，尤其是华夏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区，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占有着举重若轻的地位。相对于博大精深的嵩山文明而言，我们的研究还只是揭开冰山一角，大量的研究仍有待深入。

随后，周昆叔、王幼平、方向明、杨育彬、赵春青等专家先后就“凝聚的嵩山”“东亚现代人起源问题的新探索”“文明时代的中原和环太湖地区不同轨迹和道路的比较”“中原地区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特点”“关于嵩山文明与早期中国的几点思考”等主题作了报告。

周昆叔先生在《凝聚的嵩山》报告中认为，嵩山文明是指嵩、箕地块的太室山、少室山、箕山、具茨山和云蒙山及其周边所形成的华夏文明。嵩山地区之所以能成为中华文明起源以及早期国家的形成的核心区域，因其具有“三边（地貌、气候、沉积物）”“三水（河、济、淮）”“一山具一凹（嵩山腹地低凹地形）带两盆（禹州、洛阳）”的独特环境，适中、适宜的环境适合人类生存与文化创造。嵩山地区产生的中国、中华、中原、中州、中庸、中和等一系列冠以“中”的人文文化，可统称为“中文化”，中文化是揭示事物发展受控于中的中国核心人文文化理念，嵩山天地之中的凝聚力造就了中文化，中文化也使嵩山更具有凝聚力，其所产生的效应就是早期国家在此形成，都城的汇聚，朝代的群集，名人的荟萃，文化的昌盛。

北京大学王幼平教授报告题为《中原地区现代人类行为的出现及相关问题》。王教授通过近年来在河南荥阳织机洞、新郑赵庄、登封西施与郑州二七区老奶奶庙等多

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资料基础上，认为以织机洞、老奶奶庙遗址为代表的嵩山东南麓几百处旧石器地点，比较清楚的显示了中原地区在距今5万~3万年前的栖居形态。老奶奶庙遗址所发现的石片石器文化，在时代上也具有很明显的承前启后特点，将中原地区更早的旧石器文化还有其后发展起来的石叶与细石器文化完整地衔接起来，非常清楚地确立了该地区旧石器文化发展框架。这就有力地反驳了近20多年来西方学者根据遗传学的证据提出的世界各地现代人都起源于非洲的“夏娃说”。嵩山地区的新材料为研究现代人类和现代人类的行为在东亚地区的出现，提供了一批非常重要的新证据，也是我们新的研究视角。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向明研究员在《“文明时代”的中原和环太湖地区》报告中，对比了距今四五千年前后，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中原地区良渚文化与仰韶文化发展轨迹和道路。他认为，两者在地理环境、聚落分布规律和规模、生业经济、特别资源控制、精神信仰系统等几个方面的差异最终造成两者发展道路的不同。长江中下游地区是一个是内部稳定型的文化，它虽然影响极远，但没有扩张的欲望。而中原地区内部则充满了张力。随着特别资源的消耗，再加上距今4300年的大洪水，彻底击垮了璀璨的良渚文明，中原地区则逐步迈入了文明的门槛。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杨育彬研究员的《试论中原地区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特点》报告认为，中原地区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具有连续性、完整性、开放性。中原地区从距今一万年的新密李家沟已经出现了原始农业，从裴李岗文化直至夏商周，中原地区古代文明不同于北方的红山文化和南方的良渚文化，它未曾中断，表现出连续性。同时中原地区在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中拥有着古城、青铜器、文字、祭祀及礼制遗存等完整的文明四要素，表现出完整性。中原地区古代文明又具有开放性，它能不断吸收周边文化的精华，不断丰富和补充自身的文化内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春青研究员在《关于“嵩山文明与早期中国”的几点思考》中提出，中原地区文明起源的上限应不早于仰韶文化的偏晚阶段（即公元前4000年）。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应以夏王朝诞生作为标志，新砦二期文化是探索夏文明诞生的重要对象。嵩山地区之所以诞生了夏文明，是因其具备天时（天时）、地利（区位优势）、人和（氏族性）优势。今后夏文化研究应以物质文化遗存为基础，重点突破年代学这一难关，还要注意多学科结合。

30日下午，专家们分别就“嵩山与中原”“文化谱系与社会变迁”“农业、手工业与社会”“嵩山·中原·文明”四个主题进行分组探讨交流。

“嵩山与中原”小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吉林大学考古系主任王立新主持。北京大学环境与工程学院宋豫秦教授率先发言，作了题为《从夷夏东西说论嵩岳之地位》的报告，他认为：嵩山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和中华

民族形成过程中有着关键地位,发挥着核心性的作用。很多民族都有本民族的圣山,中华民族的圣山应是嵩山而不是泰山。因为泰山地区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及整个夏代和商代、二里冈下层时期均为东夷集团文化分布区。而嵩山周围分布着数以百计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这个数量之多、密度之大是全国和世界所仅见的。嵩山地区人类文化绵绵万年以上,且主流文化一脉相承。商代前期的郑州、偃师商城皆在环嵩山地区,商王经常问卜嵩山,西周初年,武王灭商后在嵩山举行了封禅仪式,这都说明了嵩山在中华文明起源发展中的圣山地位。

许宏先生报告的题目为《嵩山地区——中国青铜文明的子宫》。他认为,中国文明并非单线进化,可以公元前2000年为限,划分为两个大的时期:或称中原文明时期和前文明时期,或称王朝时期和前王朝时期,或称中国时期和前中国时期。以嵩山为中心的1000多平方千米的区域,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有1500多年以此为都,这在世界文明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铜器时代之前人类利用资源都是靠物理变化,对金属的利用才开始有化学变化。以嵩山为中心的中国青铜文明,是以祭祀祖先的容器和饮食器为主,这跟全球其他青铜文明形成鲜明对比。且青铜文明以嵩洛地区为中心向外全面辐射,逐渐形成一个青铜文明网,这是社会大整合的迹象,同时开启了社会复杂化的图景,开始了中国最早的大提速时代,最早的政治实体随之出现。因此,说嵩山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起源地、肇始地、孕育地,都不如子宫这个词贴切。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乃诚发言的题目为《中原地区两批距今4000年前后的王室玉器及有关问题》。朱先生从玉器的器形、质地、制造工艺等方面分析了2002年在陶寺中期小城内西北部发现的大型墓葬(2002 II M22)中出土的一批玉器,以及1965年以来在陕北延安芦山峁村的塬畔山、小峁、马家孤的向阳山坡上出土的一批玉器。他认为,陶寺文化中期的2002 II M22大墓出土的玉器以及芦山峁一带发现的那些精品玉器,是目前所见到的代表了夏时期玉器制造工艺的最高水平的玉器,有的可能是夏前期王室使用的或是与夏王朝王室有关的玉器。这一现象一方面反映了陶寺文化汇集了其他地区的玉器精华并使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另一方面反映了当时奢侈之风与权威之欲开始滋长,这都是中原地区一个新时代诞生反映在玉器上的时代新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教授叶舒宪发言的题目为《东玉西传与西玉东输——中原文明形成的资源依赖》。叶先生认为,距今4000年前,在以青铜开采和生产为主导性资源依赖的商周之前,是以华夏礼乐文化之源的玉礼器生产和使用为主的。文明中心与边缘的早期互动体现为北玉南传、东玉西传(以玉石神话信仰为核心的玉文化传播)和西玉东输(玉料资源的传播)。探讨先于丝绸之路而存在的玉石之路,至关重要。2012年石峁遗址古城及建筑用玉器的发现,使得黄河对华夏文明起源的作用得到重新审视:黄河不只是作为灌溉农业的水资源,而是作为西部玉石资源调配之漕运

交通线发挥作用的。

中国国家博物馆戴向明研究员作了题为《环嵩山地区国家社会的兴起与夏都、夏王朝、夏文化的问题》的报告。他认为：华夏文明的发展经历了酋邦、王国、帝国三个阶段。探讨国家起源，二里头是一个标杆，不论从古文献记载到考古发现，它都是一个王国社会。但是从龙山晚期的王城岗城址一直到新砦、二里头一期，都没有进入国家社会，国家的形成有一个从小到大不断滚动发展的漫长过程。它的文化圈也是从小到大扩展起来的。从整个大中原地区来看，最早的国家不是二里头，而是陶寺。因为陶寺中期城址、大型宫殿建筑群以及墓葬的规模、结构已具有王国特征，陶寺在文献上相当于尧舜时期。它偏于北边一隅，不在中原腹地，而且从文化、社会发展上看，与二里头没有直接关系，夏王朝兴起也不是因为它取代了陶寺，陶寺衰亡很有可能是因为北方集团的入侵。

北京大学城市与管理学院莫多闻教授发言题目为《中原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起核心地位》。他认为，中原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人类社会文化本身的原因，就是人和。自然环境的原因，也就是天时地利。从气候来说，距今1万年前后进入全新世大暖期，中原地区气候逐渐变暖变湿，它不像长江流域那么湿热，也不像西北那么干凉。适中的气候条件，既有利于吸收周边的文化，也有利于自己的文化向周边地区传播。从地貌来说，中原地区山地、黄土丘陵、黄土台地、平原几种地貌、地形交叉分布，多样的地貌特征和气候的结合，适宜农业发展和营建聚落。而且中原地区生业经济较为复杂，也具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另外，中原地区区域广大、地理位置居中都是相对其他地区的优势。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沈长云教授针对上述专家的发言，从文献的角度对夷夏东西说的科学性提出质疑。并对大禹治水是传说还是史实、陶寺国家与尧舜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中国国家博物馆李维明研究员在发言中对当前考古界学术研究提出了几点反思和启示，他认为学术研究不应等材料，应从原有材料深入挖掘，引出新发现、新认识，从而推动学术进步。同时也提出，学者务必求真，学术贵在创新、贵在脚踏实地辛勤积累。

“文化谱系与社会变迁”小组由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刘绪教授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袁广阔教授主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魏兴涛发言题目为《中原地区早期文明演进的基本特征——以新石器时代豫西晋南地区作为考察对象》。他以晋南和豫西两个地区为主，探讨从仰韶到龙山时期建筑等考古学文化特征的变化，包括聚落的分布情况、同一个聚落里面不同时期器具使用的情况等。他认为，裴李岗时期是聚落初步发展阶段，中心聚落并不明显。仰韶初期、早期区域聚落蓬勃发展，聚落数

量、规模稳定上升，社会渐续进步。这一时期是渐进发展模式，属于自发式发展阶段。到仰韶晚期则出现了衰落。庙底沟二期和龙山时期，吸收了很多外来因素，出现了大型和特大型聚落，呈突发性发展模式，推动社会发展走向高潮。仰韶中期的社会有明显分层，但分化不是很严重。而庙底沟二期和龙山时代则社会分化严重、社会矛盾尖锐。仰韶中期社会复杂化，奠定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基本特点和格调，仰韶晚期以后，通过不断吸收周边文明的先进因素，中原早期文明一步步走向更高的发展阶段。

首都师范大学袁广阔教授的发言题目为《早期夏文化新探》，他认为，早期夏文化不仅局限于豫东，夏文化与河济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关系十分密切。河济地区考古学文化可称之为后冈二期文化，分布范围西到焦作、济源一线，东至山东菏泽、聊城，北到安阳以北漳河一带，南达商丘、开封以南。河济地区遗址众多，城邦林立，龙山文化面貌比较一致，特征突出。后冈二期文化在龙山早期迅速强大起来，对郑州地区龙山中期文化及新砦期文化都有很大影响。龙山文化时期（王湾三期）为中原文化发展的高峰期。中原形成了两大文化体系，即分布于嵩山以南地区的煤山类型文化和分布于河济地区的后冈二期文化。后冈二期文化对新砦期文化，以及二里头的的影响很大，并且对外辐射性影响也很大。后冈二期文化的范围与《史记·夏本纪》等文献记载以夏后氏为首的夏族活动范围是完全相一致的。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王青教授的发言题目为《豫西北地区的早期社会复杂化进程》，他以豫西北地区（包括河南省济源、焦作和新乡三市）为研究对象，认为该区的社会复杂化进程始于仰韶文化时期，龙山时期（主要指中晚期）则表现出继承和发展的特点。龙山时期中心聚落及其小区分布格局的强烈变动，表明竞争性明显加剧，最终整合成至少三个更高层次的聚落区域，这三个聚落区域应是相互独立的政治实体，很可能是早期国家或酋邦。夏代“帝杼居原”可能为原城遗址（即庙街遗址），这可视为本区龙山时期的聚落格局和政治结构被彻底打破的标志性事件，本区西部开始纳入夏王朝的控制网络，东部则可能渐有先商人介入。“帝杼居原”的原因很可能与夏王朝对太行山区的矿产资源（尤其是铜铅锌矿藏）的需求和控制有关。商代，本区出现了焦作府城城址，与晋南的垣曲商城同属控扼交通要道的军事重镇，所以也不会仅仅是商王的畋猎之地，仍然与控制 and 保障铜、盐等矿产资源密切相关。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李德方研究员以《环嵩山地域文明时代早期的社会特征》为题目，主要从文献记载，总结出考古学上仰韶文化晚期与龙山文化早期——即文献上的“五帝时代”，存在突出以人为本、中和思想、治民爱民并存的治国理念。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张天恩研究员在《石寨山龙山古城及相关问题》中，介绍了位于陕西省佳县，建于庙底沟二期文化阶段的石寨山石城情况，他对比龙山文化中期以前陕、蒙、晋相邻的北方地区大量石城聚落，认为石寨山龙山古城在建设规

划，构筑的复杂性、先进性，和防御体系的完备程度上显得非常突出。该城的兴建，标志着可组织、动员更大范围的人力和社会资源的社会组织已经形成。表明以河流、水系为分域的地方性中心聚落诞生，为规模更宏大的石峁古城的诞生，奠定了社会基础。

广东肇庆市博物馆张致政副研究员的发言题目为《铜石并用时代的豫东》。他在系统分析了豫东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分期与谱系基础上，探讨了豫东对中原文明起源的作用。他认为，豫东是中原、山东、江汉三大文明区交汇处，龙山时代后期中原地区在文化碰撞中经历着深刻的整合重组，历史已经走到文明诞生的门槛边了。以往由于对豫东在中原文明兴起中作用重视不够，将新砦期文化看作王湾三期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直接中间环节引发了长久的争议，现在看来，王油坊文化—新砦期文化—二里头文化似乎衔接得更为流畅。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常怀颖博士的发言题目为《中原腹地以北地区过渡期遗存的蠡探》。他梳理了中原附近以北（河北南部、冀中地区、燕山南麓、忻定盆地、晋中盆地）区域当中，南洼三期向二里头过渡的典型遗存，总结了其共同特点，并认为在中国的中原地区和北方地区，这种从龙山时代向夏时期的过渡是“事不孤起、其必有邻”，体现了一个最早的国家 and 王国形成其中的一个时代作用。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张继华的发言题目为《论二里头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从南洼二里头聚落的发现谈起》，他认为，南洼遗址第三期的存在表明二里头前后两大期之间仍是渐进和连续演进的关系。二里头文化分期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应关注不同遗址分期研究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异同。南洼遗址的环境表明，二里头文化腹心地区的聚落仍存在大规模的防御设施。南洼遗址白陶制品的埋藏特征也反映出二里头文化白陶酒礼器的消费存在较严格的控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雪莲研究员介绍了近年来¹⁴C测年原理和方法上的改进和提高。并认为之前一些考古发现所做的¹⁴C测年的结果，如根据新的方法、新的手段，会有一些修正和提高。

“农业、手工业与社会”小组由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水涛教授和吉林大学考古系井中伟副教授主持。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王星光教授的发言题目为《李家沟遗址与中原农业起源》。他主要谈了三个问题：中原地区农业起源的探索、李家沟遗址的发现及文化内涵、从李家沟谈中原地区的崛起。他认为，中原地区是中国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裴李岗文化的农业文化已相当进步，仰韶文化已是较为发达的原始农耕文化，河南新密市李家沟遗址的发掘，为探讨中原地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及农业的起源都提供了新资料。李家沟遗址距今10 500~8600年前的石器、陶器和猪、马、牛、羊等动物标本的发现，表明中原地区的原始农业已经孕育产生，该

区域有可能已培育了粟、黍等农作物。位于黄河与淮河之间的嵩山地区，应是中原农业起源的中心区域，也是中国农业起源的核心地带。中原地区的农业起源和发展，对中华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对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均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值得加以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

吉林大学考古系井中伟副教授发言题目为《商周鞞形器研究》。指出，鞞形器有鞞、扳指等名称，功能上都与弓箭有关，是一种钩弦的辅助工具，主要是为了保护手指。他在发言中主要介绍了这种器物的形状演变、功能的探讨以及定名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春燕研究员的发言题目为《先秦时期中原地区都城遗址人口迁移的初步研究——以陶寺遗址与二里头遗址为例》。她认为，锶同位素分析技术通过对出土人类牙釉质锶同位素比值的测定，可以直接确定古代人群在不同地理区域间的移动。出土人类牙釉质的锶同位素分析对考古学研究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可以通过出土人类遗骸的锶同位素的地区特征追溯人类来源地。她从陶寺文化中晚期的墓葬和灰坑中检测了21个个体的样品，根据陶寺遗址出土古人类遗骸的锶同位素比值测定数据与当地的锶同位素比值范围作比较可知，外来者约占总数的70%左右，可知陶寺遗址的先民中，存在很高比例的外来移民。二里头遗址的先民中，检测的23个个体的样品中，外来者约占总数的30%以上。可见二里头是本地人占多数，但也存在较高比例的外来移民。

香港中文大学邓聪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中俄玉器合作计划》。他详细地介绍了香港中文大学近年来与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在玉器研究方面的合作情况及其取得的一些成就，也介绍了一些近年来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旧石器考古的一些新发现，尤其是近年在阿尔泰地区俄罗斯洞考古学家发现的距今38 000年前的玉环饰，及其他一些相当精美的玉指环和坠饰等，显示出现今所知东亚最早的玉器风采。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刘煜的发言题目是《从陶寺到二里头——中原地区出土的铜及铜合金制品的技术研究》。他利用扫描电镜—能谱、电子探针、X射线衍射以及金相显微镜等技术手段，对陶寺、新砦、二里头等遗址出土的铜器以及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炉渣样品进行了化学成分和显微结构的分析，同时根据观察和X射线透视等技术手段考察了这些遗址出土铜器的制作工艺。结果显示在公元前2300~前1500年，存在铜合金的使用逐渐增加而红铜的使用逐渐减少这一趋势，这些研究有助于构建中国古代金属技术的演进之路。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王建平副研究员的发言题目为《关于中国早期冶铜术起源的探讨》，他认为，中原地区铜器的起源最早，其冶铜技术的传统是制作黄铜，可能均为锻制而成。距今5000年左右庙底沟期仰韶文化的解体及诸文化的迁徙将中原地区的铜器技术扩散至周围地区，并发展出多种铜器技术。自西北地区出现中国最早的青铜器

后，中原和西北地区的铜器发展便分道扬镳。龙山文化晚期以后，无论从铜器材质、制作工艺，还是发展历程看，两地区冶铜技术传统不同，锡青铜冶金技术可能是各自独立起源的。中原地区应是中国铜器起源的核心地区。无论是铜器材质、技术模式、演进过程还是发展阶段，中国与西方早期冶铜术各有不同的特点，中国早期冶铜术是独立起源的。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顾万发院长的发言题目为《再论“蹲踞式”的基本类型、本质内涵及“夏”字等相关问题》。他从考古学、古文字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如气功、医学、养生学等多学科的角度，阐明了历代“蹲踞式”玉器的内涵及其与“夏”字含义的联系。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冉宏林先生的发言题目是《郑州商城手工业者居葬关系研究》。他认为，郑州商城的各类手工业作坊均存在手工业者居葬同地的现象，这种现象上可追溯至二里头时期，下可延续至晚商和西周时期，应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形成的原因或可能与当时的族群“聚族而居，聚族而葬”有关。

“嵩山·中原·文明”小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易建平研究员和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裴安平研究员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玮璋研究员的发言题目为《从断代工程到文明探源》，他介绍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主要成就，及其对考古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合作起到的推动作用。同时也谈到了断代工程引发的质疑和讨论带给我们的思考。他认为，中国历史的主要舞台是在中原，希望中华之源、华夏文明这种大的课题能提炼出若干个能够做成精品的课题，进行重点的突破，而且要不断地提供一些阶段性成果向社会推广，这样就会更有利于成果得到社会的认可。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李民教授的发言题目为《论信息传递在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他认为史前时期存在五种主要的信息传递方式：一是各种集会，比如像酋长、部落的领袖以及主要的领导人召开的集会，还有群众的集会；二是无声的传送，例如文字产生之前的刻画符号；第三种是有声的传送，例如音乐、舞蹈、歌词等；第四种是商业贸易；第五就是战争。战争之间的部族融合加速了信息的往来。因为中原地区在这五个方面都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因此这一地区信息就比较畅通，促进了文明的早日出现，而文明的发展也进一步地扩大了信息的来往，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马世之研究员的发言题目为《中原早期城址与嵩山文明》。他认为，中原地区早在仰韶与龙山时代便涌现出一批早期城址，这些城大体上呈南北一线分布，被称做南北古城线。古城线作为中原古国与嵩山文明的屏障，是为抵御东夷集团的威胁及南方苗蛮集团的干扰而设立的。他通过对中原早期城址的具体分析，认为大约在仰韶文化晚期，嵩山地区已经开始步入文明时代。到了龙山文化晚期，历史的步伐跨进了夏代，嵩山文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因此，文明形成

五千年说比较接近历史的实际。从1万年到6000年是文明的起源阶段,4000年是文明的发展阶段。嵩山文明是中华文明的缩影,大约形成于5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晚期。

南京师范大学裴安平研究员的发言题目为《聚落群聚视野下的三种中国文明起源模式》。裴先生认为一个真正的文明国家,必须是跨血缘、跨地域,对外建立了统治关系的,否则就不是文明的国家,只是属于一种国家之前的早期国家形态。从我们现在的聚落考古上可以看到三种这样的模式。一是鸡叫城——商模式,就是由一个血缘一个组织,然后经过一段过程直接进入文明古国,表现为世袭制。第二种模式是石家河——西周模式,是由血缘集团发展为跨血缘早期国家,最后进入文明,特点是分权制。第三种模式,是由血缘集团发展为跨地域、跨血缘的早期国家,最后发展为文明古国,特点是权力三元制和禅让模式。裴先生针对本组专家的发言,提出在夏出现之前,中国并没有一个文明起源的中心,而是每一个地方各自发展,满天星斗,每个地方都有早期国家和文明古国的诞生。如山西、山东、湖北、湖南等等都有,这个时候并没有形成中心。另外还提出城址在文明起源中的作用并没有那么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易建平研究员的发言题目为《从词源角度看“文明”与“国家”》。他认为在文明起源研究中要搞清楚“文明”与“国家”这两个概念本身的来龙去脉。他从词源学角度,考察了这两个词在古希腊文、古拉丁文、法文和英文等文字中的演变,得出结论认为,在欧洲文字中,“文明”与“国家”本是同一个词。因此,现在许多考古学家将“文明”与“国家”区别为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将“文明”更多地解读为“文化”,或者将“文明”区分为“文化”与“社会”两大部分,从词源学角度看,并无根据;将“文明”与“国家”解读为同一个概念,可以让研究者拥有更大的自由度,使用各式不同的“文化”材料,来解读各个地区不同社会“文明”与“国家”的起源与形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易华研究员的发言题目为《中华文明是复合文明》。他认为中华文明本土起源说和外来传播说均不能圆满解释中国民族与文化的来源与形成。青铜技术、山羊和绵羊、黄牛、小麦、砖建筑物等都是从西方往东传播的。中华文化不应该是以定居农业生活文化为基础,而应该是整个吸收了青铜游牧文化所有的要素,结合了定居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一个复合文明。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武家璧先生的发言题目为《试论嵩山文明中心的形成》。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的“五帝时期”是神权社会,权力合法性源自神的世系——“帝系”,统治者自称神的后裔而世袭神权,通过封禅泰山称“帝”,共有“五帝”。早期帝都涿鹿(徐州)、穷桑(曲阜)等位于通往泰山的要道上,被东夷控制,故“争帝”战争主要在华夏和东夷族之间进行,而以华夏族的胜利告终。龙山时代的帝尧时期统治中心西移至中原地区。五帝之末选贤任能治理大洪水,神权让位于

王权，“王者居中”成为政治目标，但保留了“君权神授”和世袭的传统，新的政治中心仍然依托神山的保护。禹都阳城依托嵩山为神山，周武王依“天室”建新都、周公营建洛邑“俾中天下”，最终将“天下之中”定位于靠近嵩山的洛阳，故自夏商以来，以嵩山为中心的早期中国文明得以形成。汤武革命打着“君权神授”“顺天应人”的旗号，实现了世袭王权的更替，从此革命和世袭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权力合法性的来源。

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吕世浩教授的发言题目为《东周秦汉时期的“中国”义涵》。他认为“中国”一词在东周秦汉时期有一巨大转变。从原本的“中央之国”逐渐演变为“中道之国”，从地理、血缘的义涵转变为文化、道德的义涵。这一转变与东周时期诸夷的入侵与急速华夏化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观念的转变，总结完成于西汉时期。夷夏之别终于彻底摆脱原来的血缘因素，而改为以文化来区分。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郑杰祥研究员的发言题目为《中原地区古代文明形成特征探讨》。他认为，夏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政权，它的出现，标志我国数千年的文明时代自此开始。夏部族是生活于嵩山地区的原住民，并在这里兴起发展，创造出先进的文化，即考古工作者所称作的二里头文化。夏王朝在原始氏族制度上建立起来，它有着明确的时代和地域特点，可概括为：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世袭制的、政权和族权牢固结合的、崇尚礼制的、确立了相对统一的中央王权，这构成了夏王朝即我国早期国家政权的基本特征。

郑州市社科联副主席窦志力先生针对本组诸位先生关于文明、文化的话题，谈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文明是什么？文化是什么？窦先生认为：我们近代以来的话语体系，建立在一个欧美话题体系框架下，包括我们一些近代所用的词汇，大部分是受两个国家的影响，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俄罗斯。在做具体研究的时候，很多并不适用这些外来的模式。第二，中华的文明早期文明由哪些要素构成？第三，我们现在应建立多种学科的研究体系，应该有哲学、美学、文化人类学以及文学等多学科共同介入，才能够使我们真正地建立中国学人的发言体系。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靳松安教授的发言题目为《论文化交流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中的地位与作用》。靳先生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可以分为早期、中期、晚期、末期四个大的时期，根据各时期主流文化特征，新石器时代中期又可称为裴李岗时代（公元前7000～前5000年），晚期可称之为仰韶时代（公元前5000～前3000年），末期可称之为铜石并用时代或龙山时代（公元前3000～前2000年）。仰韶时代中期，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对周邻文化有着极其强烈的辐射与影响。这可以说是中国史前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潮。龙山时代早期比较强势的文化主要是大汶口晚期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早期文化和良渚早期文化，它们对